

学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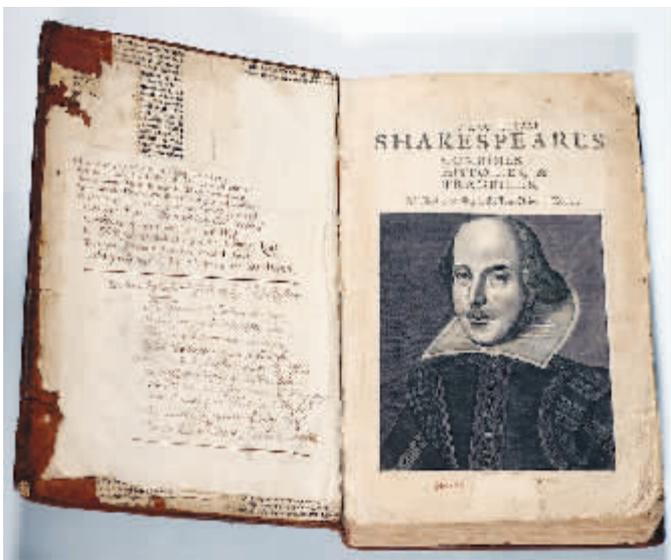
← (上接7版)

骄傲自负的一国之君，馆长的答复简单明了：“很抱歉，国王陛下，我们的书不外借。”国王听完馆长的解释，看罢章程，竟然打消了借书念头，还表示，他本人尊重图书馆创办者对书籍和知识的一片虔诚之心和遗愿，不会破坏章程。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努力，博德林图书馆的藏书早已在英国和整个欧洲享有盛誉，想凭借特殊身份借书一观的，大有人在。1654年4月，权倾一时的护国公克伦威尔出面为当时的葡萄牙驻英国大使向博德林借书。图书馆的第三任馆长托马斯·巴罗(Thomas Barlow)依从前例，寄送一份章程给护国公，并复信说明不借书之原因。让人意想不到的，克伦威尔不仅不以为意，当年早些时候，还将自己所藏的22部希腊手稿送给了图书馆。1630年，时任牛津大学校长的彭布罗克伯爵去世，临终前将平生所藏珍贵希腊手稿中的绝大部分(约250部)捐赠给了博德林图书馆，剩余手稿中有22部辗转流散至克伦威尔手上。由于克伦威尔的捐赠，这些当年彭布罗克伯爵赠给图书馆手稿中没有捐出的部分也入藏博德林，使得彭布罗克所藏珍贵手稿完美合璧。

其实，“书不外借”仅仅是博德林图书馆早期章程中的一小部分。为了使构建一座“伟大的学术性公共图书馆”的梦想走得长远，博德利早在1605年就草拟了颇为细致的章程。从篇幅上看，这份章程比他撰于1609年的生平自述要多出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图书馆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章程事无巨细，涉及图书馆建设的方方面面：(1)馆长任职条件；(2)馆长遴选者宣誓；(3)馆长宣誓；(4)馆长辞职条款；(5)捐赠者登记；(6)书籍入藏；(7)开放时间；(8)不许人工照明；(9)书籍上锁与否；(10)馆长助理遴选；(11)书不外借；(12)馆长假期；(13)馆长薪资；(14)馆长助理薪资；(15)读者条款；(16)读者宣誓；(17)惩罚条款；(18)外部到访者条件；(19)冗余书籍处理；(20)大学副校长的职责……

博德林图书馆能够走过400多年，与博德利这份卓有远见的章程密不可分。尤其是“书不外借”、“不许人工照明”这样的条款，保障了图书馆的“长治久安”。书籍不能借出，为研究者开展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但事实上这也避免图书馆重蹈因读者“只借不还”而归于倒闭厄运的覆辙(书不外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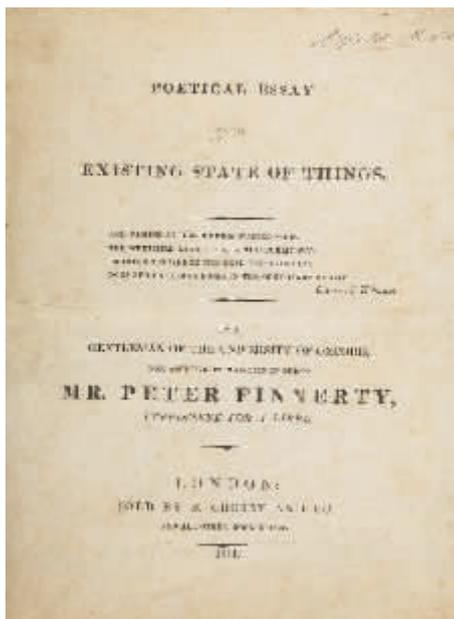
极其珍贵又具传奇色彩的1623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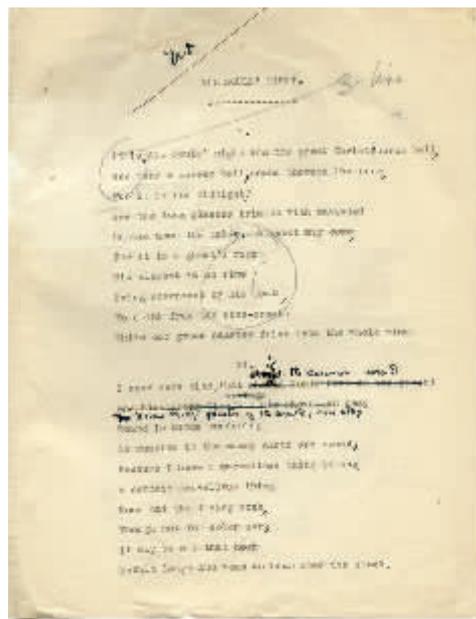
馆藏最小的抄本，系1654年之前的书籍，自17世纪中期开始展出，始终是最受欢迎展品之一。



“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手稿



2016年博德林收入的雪莱诗文集。该册页约出版于1811年，18岁的雪莱出版此小册后被牛津大学大学学院开除。



叶芝《万灵节之夜》草稿，上有其修改字迹。他曾在牛津宽街45号居住五年，此地现在是威斯顿图书馆。

的条款在1856年后有所松动)。而不许人工照明，则主要是出于防火考虑。只能用日光照明，意味着图书馆不能装备人工火源，与之相应的，取暖也成了大问题。想想几百年前，在朔风呼啸、阴冷潮湿的英格兰，坐在空旷的阅览室里几个小时，即使裹着厚厚的羊毛大衣，依然冻得瑟瑟发抖，什么样的人受得了。17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后学院的院长葛瑞德·朗贝因(Gerard Langbaine)和东方学者萨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因在图书馆受冻先后去世。1701年，图书馆长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在致副校长的辞职信中说，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值守在图书馆里，凄风苦雨，实在是一件苦不堪言的惨事。

图书馆的种种不便，在其创办者博德利眼中，都是为了图书馆的真正主角——书籍的安全。这些条款看上去确实有些不近人情，但它们实现了博德利的宏愿，保证了图书馆的安全。1845年，图书馆安装了锅炉和取暖水管，1905年又新装了电灯，但这些都是反复

论证确保万无一失的前提下进行的。

“拯救知识于洪水的方舟”

博德林图书馆的早期发展，与其创办人的执着和前几任馆长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博德利自身才华过人，虽未从事学术研究却具有不凡的学术识见，他理想中的图书馆是一座学术性的图书馆。基于此，他选图书馆馆长时也就格外挑剔：必须是聪慧多识、研修语言学的学人，诚实可信、行动能力强还要性格谨慎；为避免工作分心，必须是未婚青年。选来选去，选中了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的托马斯·詹姆斯。詹姆斯对图书目录之学很有兴趣，当时正在编纂牛津、剑桥的存世手稿目录，而其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的伯利著《书之爱》(第一个英文译本)也接近尾声，语言功底相当不错。

除了优秀的管理者外，16

世纪末17世纪初，还有几个因素为博德林图书馆的崛起创造了便利。首先是现代印刷术的兴起。自1450年左右，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印刷术在欧洲和英国获得长足进步，尤其是英人威廉·卡克斯顿自欧洲大陆返国从事印刷出版，大大改变了英国出版业的落后状况，书籍生产能力迅速提升。其次是修道院图书馆的衰落。在大学图书馆兴起之前，西方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掌控在国家与教会手中，修道院图书馆因此成为重要的藏书机构。而英国15、16世纪的宗教纷争，令修道院成为纷争不断的场所，图书馆也因此风雨飘摇，这些散出的书籍，流入新型图书馆，成为新的收藏。再次，是个人藏书的崛起。16世纪中期时，一般学者轻易就可达到100册的藏书，而私人图书馆往往会有两三百本藏书，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当一位学者过世的时候，其藏书常常会成为图书馆的收藏。博德林图书馆的早期收藏，得益于这三者甚多，此后的扩充亦多有赖于此。自

1599年12月首次与詹姆斯通信起，迄1613年1月，博德利与詹姆斯通信231封，事无大小，俱与图书馆与书籍收藏相关。期间，由于詹姆斯的建议，博德利通过与伦敦书商公会的洽谈，使博德林图书馆成为当时英国最早的版本图书馆(英国的版本图书馆，有时7家，有时5家，但博德利总是名列其中。其他几家是：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爱丁堡律师图书馆、都柏林三一学院)，“英国书商出版的任何一本书都需要递交一册”，这是博德利早期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博德林图书馆早期藏书的最重要来源是捐(遗)赠而非购买。1613年，博德利去世之前，他每年都会向他那些“社会地位显赫的朋友”写信，请他们赠书，如果有回复但尚未落实，他会不厌其烦写信提醒。在给詹姆斯的通信中，有不少涉及如何与某位绅士打交道争取无偿赠书的内容。博德利的好友、默顿学院院长同时

(下转9版) ➔